

对科举制误解的解读及给予的当代启示

王刚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如何选拔官员，做了许多尝试。许多的制度在初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逐渐丧失了其公正性而被逐渐淘汰。最终，自隋朝开始，科举考试成为历代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至清末 1905 年废止，一千多年来，科举制作为实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举制，简而言之，即是通过统一、严谨的书面考试形式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自 20 世纪以来，科举制几乎成为中国封闭落后的代名词，成为备受争议和批判的一种制度。尽管近期不少的学者开始对科举制作全面、客观的评价，但是对科举制依然存在些许误解。这些误解不仅使我们很难客观、公正的评价科举制，更重要的是造成了观念上的禁锢，人为的设置了一些禁区。

一、对古代科举制的误解及解读

1. 科举制禁锢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造成了近代科技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自清季主张废除科举制的呼声以来，即认为“科举之制……妨碍人才”，一直以来，也认为这是科举制最大的诟病。诚然，科举制的确将全国的知识分子纳入同一种模式的思维和知识传递中，对于人才资源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正如 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当时的报刊文章评价科举制的流弊所言：“（科举时代）由进士而得官者，每二年才三百人，然则停滞于考试中者，通国者当不下数十万人矣。此数十万人，大都进不能得官，退不能迁业”^[1]科举制造成了一批沉淀于社会又不为社会所接纳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科举制造成了思维的僵化、观念的匮乏和人才的单一。

尽管实施科举制后，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诟病，但是严格的说，这种后果不应该归咎于科举制。造成这种局面的是古代中国极端集权的帝国官僚制体制。中国的历代的封建王朝，沿着一条逐渐强化中央、强化皇权的路径发展。最终在明清达到集权顶峰。但是，不管是在稍微民主开明的唐宋，还是在极端集权的明清，整个官僚集团相对于社会而言，都是极端集权的。官僚集团掌握了整个社会的一切资源调配，社会的其他阶层都必须从属于这个官僚集团的控制。这种社会权力的极端统一，使整个社会都向官僚集团集中，其他的社会成员力争能够进入到这个集团内部。与这种极端的权力统一相配合的还有一种途径，即科举制，可以让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阶层成员流向这个权力集中的官僚集团。毫无疑问，极端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才应该是造成中国科技落后、人才匮乏的主要原因。如果说科举制在这方面存在弊端的话，那就是科举制的存在释放了其他从属阶层对官僚集团的抵制，使这种极端专制集权的社会结构得以长时间的存在。如果废除了这种权力集中的社会结构，形成多个权利相等、相互制衡的社会阶层，科举制的实施，必然不会形成单一僵化的社会思想，也不会造就众多的“进不能得官，退不能迁业”的无用知识分子。

2. 科举制造成了官员的腐败。对科举制的另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科举制容易造成官员的腐败，很多的学者将封建官员的腐败归咎为科举制的实施。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在严格执行科举制选拔官员的时期，是官员较为为廉洁的时期。当科举制日益遭到破坏的时期，也就是官员腐败成风的时期。封建官场的腐败往往与统一、严格的科举考试遭到破坏联系在一起。最有代表性的是清季科举制的没落。清朝末期，出于财政压力，日益增加捐纳、保举等非科举方面官员的数量，而正途科举出身的官员获得功名后许多不能入仕，日益积压。据记载，“太平天国以前捐官的总人数为 3.5 万，而 19 世纪最后 30 年，捐官人数达到 53.4 万。1860 年以后，捐纳而来的四品至七品地方官多于科举正途得官人数。有职衔者，捐纳比例高达

66%。”^{[2] (P153-154)} 捐官的激增，使科举制日益边缘化，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吏治腐败日甚一日，造成仕途壅阻不堪。^[3] 捐官数量的大量增加和仕途上发展的优势，造成的腐败风气充斥官场。官员的升迁不是依据官员的学识、人品和政绩，而是纳捐的财富数量。而且依靠捐担任官员很容易产生聚敛财富的冲动，以回收纳捐的财富。

由此可见，科举制对于保障官员的廉洁发挥了重要作用。严格、公正的科举制的确能够选拔出优秀、廉洁的封建官吏。历代封建王朝的腐败，也往往首先体现在科举制的腐败上。当科举制失去它的严格性和公正性时，或者其他的入仕途径占据主导地位时，伴随而来的就是官员的腐败。

3. 科举制等同于八股文等僵化、呆板的考试形式。对科举制的批判往往和八股文联系在一起。或者认为科举制就是采用八股文的考试形式。实际上，历代的科举考试形式和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只是在明清时期才采用八股文的考试形式。唐朝的科举考试内容繁多，其中主要分为明经和进士，而又以进士最为重要。明经科的考试又分为“帖经”和“墨义”，即测试考生对经典文句是否熟记。以后明经科又增加“时务策”一门，以考察考生是否具有政治见解。进士一科，唐初仅测试“时务策”五条，后来又增加帖经和杂文。^[4] 至北宋王安石变法后，又将明经科并入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和墨义，而增加“经义”一门，与策、论并驾齐驱。明朝的科举考试基本上分为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义理，第二场考论说、判语、草拟诏诰章表等，第三场考经史及诗赋。明初科举选拔很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尤其是永乐一朝，选拔的进士均擅长论说、判语等公文文书。只是自明中叶以后，才逐渐发展了一种以古人口气撰文，有严格排偶分股的应考文体，即八股文。

由此可见，八股文的考试形式，在整个科举制时期并没有占据很长的时间。而且，清朝康熙年间曾经一度停止八股，改试策论，只是不久又予以恢复。清末早在科举制废除之前，光绪帝即在 1898 年下诏停止八股试文，要求考试内容“讲求实学为主”。1901 年，慈禧又予以重申，“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5] (P98)} 八股文只是科举制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一个时期的插曲，科举制在更多的时期是一种内容丰富、讲求实效而又要求严格的考试选拔制度。

二、解读误解后给予我们的启示

对科举制误解的一些解读，除了有利于对科举制予以重新认识外，最重要的是可以澄清一些以前思维的误区，而对我们现在的观念和实行的一些制度予以重新审视。尤其是当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当前阶段，需要行政体制的改革予以推进的时候，对科举制的反思会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1. 扩大社会向上流动的途径和空间，改变官本位思想。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集权不仅体现在皇权的专制上，它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某一个集团的集权上。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高度集中在帝国官僚集团手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社会简单化。中国的古代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中国是一个二元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发展成三元的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简单的分为政府和社会的直接对立，政府将社会的一切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社会的其他阶层如果要获得一定的资源，必须依附于或者进入官僚集团之中。这种社会模式使官僚集团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他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向心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当官僚集团为社会其他阶层提供一种途径可以进入时，可想而知，它对中国的影 响有多大。尽管现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进步，但是这种影响时至今天依然存在。公务员考试每年吸引了大量的社会人员报考，就是一个很好地说明。中国如果要改变这种社会状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官僚集团统筹一切社会资源的权力结构。产生几个与官僚集团地位相平等的社会阶层，根除官本位的思想，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

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人事管理本身选拔一批真正有志于从事政府管理的优秀人员。人才的分流才可能促使人才真正发挥效能，而不至于将整个社会禁锢到一种思维模式和观念框架中。

2. 公务员选拔应该建立严密、统一的考试选拔制度。中国古代经历了察举、辟署、征召、九品中正制等众多官员选拔制度后，最终落到科举制上，说明科举制的确能够有效的选拔出一批优秀的官员。诚然，古代其他的官员选拔制度（例如九品中正制）能够将一些才能全面的人才举荐出来，但是它的有效实施需要一批公正、廉洁的选拔官予以匹配。九品中正制最终的废止，主要的原因在于选拔官员的中正官失去了公正性。当前的政治学理论假设政府官员是自私自利的，是经济人，需要建立一套制约制度对他们行使权力进行制衡。如果说在信奉“贤人治国”的古代中国，其选拔官员的制度最终都落在了严格统一、非人格化的科举制上，那么，当前中国的公务员选拔更应该建立一种严密、统一的非人格化考试制度。

尽管当前的公务员考试成为全国瞩目的核心，但是公务员考试在内容、标准和时间安排上极不统一。面试较之笔试占据更主要的分量，直接降低了公务员考试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如果说当前公务员考试的这种人为设置的不统一，是出于对以前统一规划的科举制后果的一种担忧，那么，当对其作了解读后，公务员选拔有必要建立一套严密、统一的考试选拔制度。

参考文献

- [1]论科举制后补救之法[N]，中外日报，1905年9月10日
- [2]王先明：近代士绅——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3]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J]，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 [4]程念祺：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的发展[J]，学术月刊，2005第11期
- [5]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王刚

作者简介：王刚（1979.1—），男，山东青岛人，讲师，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

地址：山东青岛市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邮编：266010

电话：13964294154

E-Mail: wgang78@126.com